

纪念和学习李达同志

——哲学系教师座谈纪要

我校哲学系是老校长李达同志于1956年亲自创办的,他曾一度兼任系主任。在李达同志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和李达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召开哲学系部分教师纪念和学习李达同志座谈会。与会同志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结合着自己的切身体会,畅谈老校长毕生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表达了对老校长的深切怀念,一致表示要学习老校长为坚持马列主义真理、抵制“左”倾错误和林彪的“顶峰论”而献身的革命精神,要学习老校长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关心群众、平易近人的革命品格和作风。

大家在谈到老校长对党的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时,深切感到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护。他在创办哲学系的时候,为了罗致人才,亲自写信与有关单位联系,有时还亲自登门拜访,不辞辛劳,到处奔波。平时,他还通过各种方式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关心青年的成长。雍涛同志以自己为例说,1958年我在化学系作青年团的工作,写了一篇很短的学习辩证法文章发表在校刊上,老校长看到后就向有关领导问我是干什么的,要把我调到哲学系来。这样我就到了哲学系,以后又被送到人大进修。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对哲学可以说还没有入门,但他老人家却那样的关怀,使我深为感动。何天齐同志说,我1963年报考研究生也是老校长支持的。谭臻同志说,老校长为了办好武大,办好哲学系,真是一心一意。我1953年在武大毕业后留下来当政治辅导员,是在老校长的支持下到北大去学哲学的。肖荃父、朱传梁等当时在北京进修的同志说,老校长每次到北京去开会,无论怎么忙,总要把在北京学习、进修的武大同志找到他那里去畅谈,或者亲自去看这些同志。他谈话的中心内容总是如何办好学校的问题。谭臻同志说,有一次,老校长亲自到北大研究生的宿舍里来看我。别人看见老校长都亲自来看我,还以为我在学校里担任了什么重要领导职务呢,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刘纲纪同志说,我刚由北大分配到武大时,本来是作李老的研究生的。但我的志趣是想搞美学。当我向李老提出来时,他非但不以为怪,而且非常支持我,亲自为我写介绍信,让我到北大进修。

老校长关心群众的精神也是很感人的。肖荃父同志说,我患了眼病,老校长拄着拐杖两次到我家来看我,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李德永同志说,我是老校长把我从天津一个中学里调到武大哲学系来的。当时我全家都在天津,我的爱人是一个家庭妇女。老校长却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要我搬家搬到武大来,我真是喜出望外。他还怀着深情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志到老校长家里拜年出来,老校长把我们送出门外后,便回头对身边的助手王玄武同志说,你看,李德永瘦多了。这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平时和老校长很少接触,而他却连我胖瘦都注意到了。老校长对教师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李鸿烈同志说,我刚到武大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师,可是老校长很尊重我、关心我。我的爱人在人大是学习俄语的,当时武大有关部门认为在校内不好安排工作,准备与校外的中学联系。老校长知道后说:“何必别人跑呢!”他费了很大的气力设法把我爱人调到武大来了。他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

大家还谈到,老校长一向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看作学校的中心工作,对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抓得很紧。李鸿烈同志说,我讲了一年课,老校长就亲自到课堂上听了三次。听完还找我谈话,充分肯定我的优点,也指出我的不足之处,还对我说:“年轻人,有点缺点不要紧!”这使我受到多大的鼓舞!徐瑞康等同志说,老校长很强调教师要自编教材。我们教研室现在即将出版的欧洲哲学史一书,就是由老校长倡议,在自编教材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教学实践,反复修改而成的。原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同志也谈到,老校长不仅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而且要陶德麟同志用它作为教材在哲学系一个年级里讲课,要黄德华等同志辅导。同志们在发言中还说到,老校长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是十分关心的,曾要副系主任李其驹同志把1962年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送给他看。老校长还多次指出,提高教学质量一定要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不要眼高手低,要勤于动脑动手。唐明邦同志深有体会地说,1962年我去湖南详细调查王船山的材料,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就是由于老校长的支持和督促。

回顾老校长的一生，同志们感到，老校长不仅是我国老一辈的革命家、理论家，而且是一位教育家，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段启成同志说，我因参加编辑《李达文集》工作，接触了一些文章和史料，我感到，李达同志可以说是中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他曾经创办外语学校、平民学校，担任过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学长。后来又在各大学长期任教。解放后曾担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路线。孟宪鸿同志说，李达同志的教育思想是很高明的，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回头来看，更觉得可贵了。他的办学思想立足于培养人才，要求重视提高教育质量，提倡师生打成一片，互相尊重、互相爱护，造成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自由讨论、互相切磋的良好空气。陈克晶、陈祖华同志说，老校长经常讲，一个学校、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几个学术上的带头人。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派和学术中心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老校长的教育思想是正确的。陈克晶同志很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对老校长怀疑过，甚至要打倒他，现在看来，真是老校长的不肖学生。他说，我们哲学系是李达同志主持创办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荣，为什么不照他的主张办系呢？大家回顾办系的历史，深感人才可贵，人才来之不易。十年浩劫搞得是非颠倒，伤了哲学系的元气，后来人才又不停地“外流”。看来要办好哲学系，非有老校长那种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的精神不可。

座谈会上，一些曾经在老校长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很有感情地说，老校长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刻苦的学者。1961年开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他已是年逾七十的人了，又身患多种疾病，一拿笔手就发抖，但他仍然顽强地学习和写作，只有晚饭后一段时间听听新闻广播，和助手们聊一下。即使后来被打成“黑帮”，助手们统统被赶走的时候，他还表示要一个人写下去，那怕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他学风踏实、严谨，实事求是。对助手严格要求，他反对人云亦云，要求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创见。有一次一位助手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看后批了几个字：“唯陈言之务去”，要求重写，使这位同志深受教育。

大家还说，老校长是学术上造诣很深、声望很高的专家、学者，但却非常谦虚。他同助手、教师甚至学生讨论问题，总是采取平等的态度。他有时和大家进行激烈的辩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没有任何不屑于与青年讨论问题的样子。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回忆说，他们曾和老校长在封建社会分期问

题上发生过争论，老校长主张西周封建说，他们却主张战国封建说，各不相让。但是争论过后，老校长毫不介意，并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谈到老校长的民主作风，田龙九同志说，李达同志作为校长，任命一个副系主任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是他却来征求我们教师的意见，用商量的口气说，余志宏同志是研究经济学的，来担任系领导职务怎么样？我看是合适的，你们看怎样？

座谈的同志还谈到，李达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写下许多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著作，这是十分可贵的。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下了通缉令，指出他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但他毫不畏惧，在这一年的11月初，又重新出版了《现代社会学》。在三十年代初，他在一次讲演后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和右锁骨被打断了，特务们还抄了他的家，但他不退让，仍然坚持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不少革命青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所作的理论工作在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和培养了一代人。同志们谈到李达同志的这些活动，都不禁被他这种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不惜献出一切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大家认为，李达同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上的坚定的原则性。他对于经过自己认真研究、确信其正确的观点，是决不因为听到什么“风”就轻易改变的。1960年他为湖北省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写了认识论一章，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倾向。当时刮来一阵风，说他的观点是“旧唯物论的感觉论”。1961年夏天他在庐山当面质问了康生，谈了四个小时，明确表示要进行反批评。康生却狡猾地哈哈大笑说：“你是权威嘛，何必同他们计较！”很明显，康生没有支持他的观点，不同意他进行反批评，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动摇，不随风倒。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反对的是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唯心论，是造成当时及后来一切“左”的错误和浩劫的思想理论渊源。作为一个理论战士，他对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一向是积极参加的。但是，从五十年代末起他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淡，根本不参加当时的一些“批判”。有的同志劝他写点文章，表示态度，他还是不动笔。他敏锐地觉察到那些“批判”的气味不对，他说：“现在好象要打倒老东西了。我也是个老东西，要不要打倒呀？”当林彪鼓吹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走“捷径”的时候，他却坚持要系统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埋头写他的书，好象他根本没有感到外面的政治温度是愈来愈高，“风”是愈刮愈大。其实，他何尝不知道呢，他是不同意！他反复向他的助手说，写教科书要注意系统性、逻辑性、科学性，联系实际不能生拉硬扯。他

还说,论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要实事求是,不要硬讲成这也“发展”,那也“发展”,甚至把一个新的用词、新的语句都说成是“发展”。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与优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他所拟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编写提纲,其中标题用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他不同意离开真理的具体性而片面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的作法。1966年初,康生找他去传达所谓“精神”,说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这是唯物辩证法上的一元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道理,仍然坚持三十年前他在《社会学大纲》中论述的观点,并断然对助手说,这是学术问题,同谁都可以争鸣,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书还是照原来那么写。

李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始终保持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十分敏锐地觉察和抵制“左”倾思潮。同志们回忆说,李达同志对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坚决反对,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多次说: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列宁说过不能剥夺农民,我们为什么要剥夺农民?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他针对那时“左”的错误,写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一文,并在学校的党代会上作了发言,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要看到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我国现在还是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得不适应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反对“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助长平均主义倾向”。1959年他在青岛,当一位负责同志向他讲了

(上接32页) 这是他一九四七年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时编写的讲义。在这部讲义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各个法学流派的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的批判。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的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武大法律系编辑的《法律研究资料》,已将其中“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一篇分期陆续发表,以供有志研究法学的同志们学习参考。写到这里,不禁联想起他的不幸去世。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新中国的法学继续作出他的可贵的贡献的。

庐山会议的情况后,他心情沉重地对陶德麟、肖楚父同志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右来了?”“党内出了怪事!”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说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反党,那“不可能”,“想不通。”1962年他回到家乡零陵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五风”的危害和农民的反映。他明知彭德怀同志因为写了意见书而受了严重打击,还是毫不含糊地对零陵县委的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把自己调查所得的情况要秘书曾勉之同志整理成书面意见,由他本人当面交给县委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在庐山会议及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之后,他仍然不畏风险,敢于上书直言,充分表现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他对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左”的做法,也能敏感地觉察和坚决地抵制。1958年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时间太长,影响了专业学习,他非常不满。他说:“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呢?”一再指示系里负责同志催促师生赶快返校。他对当时学校搞的“拔白旗”、“师生打擂台”,打乱教学秩序的做法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的“革命”是“胡闹”。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斯坦,他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1966年3月间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喧嚣一时,他不畏权势,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进行驳斥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有人当场提醒他,那是林彪讲的,他毫不犹豫地說:“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那个说的,不合乎辩证法,我不同意!”正因为这样,他遭到了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同志们说,李达同志的一生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海波、王鲁整理)

(上接36页) 就亲自去我家看望。我也就是在李校长一片诚心的感召下,终于消除了不愿来武大工作的情绪,而暗暗下决心应在这里好好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不过三十几岁,还是个名副其实的青年教师,而李校长呢?就不说他的名望、地位,单就年龄说当时也长我一倍,但却始终以平等态度对待当时的我和其他象我一样的年轻人。对比之下,今日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不仅不去主动接近群众,甚至群众登门求见也难上加难,能不叫人感慨不已吗?李校长这种热心办学、奋不顾身的精神,和关心人、尊重人、平等待人的思想作风,也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激励我前进!